

修远视野书系

新周期

逆全球化、智能浪潮与大流动时代

The New Period



汪晖
王湘穗
曹锦清
等著

新 周 期

汪晖
王湘穗
曹锦清
等著

逆全球化、智能浪潮与
大流动时代

The New Period



© 汪晖等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周期:逆全球化、智能浪潮与大流动时代 / 汪晖等
著. —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205-09101-9

I . ①新… II . ①汪… III . ①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 ① D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0535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环球东方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17

字 数: 22 千字

出版时间: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马 辉 董 喃

责任校对: 刘再升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书 号: ISBN 978-7-205-09101-9

定 价: 48.00 元

The New Period

世界进入新周期 中国开启新时代

修远视野书系

丛书策划：陶庆梅 何崇吉

本册主编：柯贵福

序言 新周期：逆全球化、智能浪潮与大流动时代

——21 世纪的知识生产与问题意识面临的挑战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的这段话，还原了 19 世纪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结合彻底地颠覆了旧欧洲，也让新欧洲成为现代世界秩序的主要奠基人。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描绘的，从 1789 年到 1914 年，欧洲经历了“漫长的 19 世纪”，一轮轮战争、革命、工业科技进步、对外扩张的浪潮前后交叠，伴随着铁与血、金钱与武器、观念与力量、意识形态与组织体系，欧洲的影响力遍及全球。对于欧洲而言，“漫长的 19 世纪”是一个新的起点，过去和现在发生深刻的断裂，原本处于亚欧大陆边缘的欧陆诸国，也真正奠定了对欧亚传统大帝国的全面优势，中心与边缘关系逆转。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等文明形成生死考验的“动荡的 20 世纪”。横亘在亚欧大陆的各大巨型帝国相继土崩瓦解，战争与灾祸吞噬了无数生命和古老遗迹，但让人目瞪口呆的是许多古典文明也能在这短短的 20 世纪中再度从灰烬中生长出新的身体，塑造出新的国家，重新成长为全球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今天，当 20 世纪伟大的历史戏剧尚未从我们记忆中远去，对于新千年的乐观情绪却再度转化为对不确定性的普遍忧虑，马克思的话语再度浮现眼前，成为不再只是属于知识

精英的独特心态，而是真正为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族裔、不同阶层的人们所分享的一种普遍心态。

“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动荡期吗？”这是多少人在心中默念的恐惧与疑虑。然而，变革并不一定带来动荡，盲目的行动和故步自封的自负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今天的我们，有必要穿透上述现象的层层迷雾，去把握新时代的脉搏。人类社会在遭遇重大变革之际，往往也是思想者需要重新检讨知识和理论之时。19世纪中后期，面对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改变，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等人，以各自的研究理解变革、指导实践，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知识和理论。今天的我们，也需要去理解变革背后的基础性要素，去理解推动变革的动力机制，这也是“新周期”问题的最终关切之所在。

本书作为这一系列研究的开篇，就新全球化格局、新经济形式、新社会机构以及新治理形态进行了一些观察和梳理。我们用“逆全球化、智能浪潮和大流动时代”这三个概念，暂时命名这些我们可感但未必深知的新趋势。

首先，全球化前景复杂性凸显。“逆全球化”也许未必能够准确描述当下的世界局势，但确实能反映时下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和忧虑情绪。过去数十年，人们习惯了高歌猛进式的全球化。但近十年来，这种全球化模式遭遇着重大挫折和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国际经济持续增长的幻象，十年以来，世界并没有走出危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全球政经格局的不确定性也不断增长：从欧洲到美国，“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欧债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让主流舆论界目瞪口呆、茫然无措；从埃及到叙利亚，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如昙花一现，战争却如影随形、持续发酵；在非洲和南美诸地，当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失速之时，在资源溢价浪潮中收获红利的各个国家，再度暴露出内部治理的无序与失败。这些事件和动荡导致了越发普遍的忧虑情绪。但动荡只是表象，其背后是全球化红利分配的高度不平衡。本书的第一部分重点分析了这一问题，并指出原有全球化模式

中的全球资本流动与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双重不平衡，使得原有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需要深度调整。资本全球化和生产链条的全球分布全面重塑了劳资结构、政商关系以及经济上的中心与边缘格局，导致了全球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裂，进而使得传统的经济治理模式和经验无法调节全球性的社会和政治矛盾。

其次，人们对技术进步的乐观情绪正在转化为失去对技术控制能力的深刻忧虑——尤其是在面对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化浪潮”之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正在与传统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并由此改造了工业生产形态、分配形态和消费形态，深刻颠覆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数十亿人被卷入到这一过程之中。一方面，随着新技术缩短了物理时空秩序，信息反馈也更加迅速，“智能浪潮”确实使得生产和生活更加便利。互联网、物联网的普及使得对生产环节的分布式管理变为可能，定制化生产、柔性生产开始大规模出现。普通人的生活也在被重新塑造，拥有一部智能手机仿佛就拥有了世界，不仅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实时交流，还能同时进行学习、工作和娱乐，甚至可以依靠手机来获取所有生活所需。但是，另一方面，“智能浪潮”也使得人类在过去数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技术管理模式逐渐失去效用，“系统性失控”和“技术恐惧”也不再只是属于哲学家的忧思，而是在生产和生活的现实中不断出现的活生生的现象——机器换人、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就业，已经不是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由新技术变革及其引发的生产形态变革，其发展趋向，也许会逐渐溢出我们的认知范围；在新趋势带给未来社会的冲击面前，我们也许真的会束手无策。

最后，是人、财、物广泛、迅速的全球流动，对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提出了全面挑战。与19、20世纪相比，21世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流动时代”，对人类提出的治理挑战也前所未有的。在美国和欧洲，长期以来引入外

部劳动力、第三世界技术精英的政策取向，正因为少数族裔的认同问题、新移民的融入问题、难民危机问题而遭遇挑战；在中国，一方面是国家内部地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人员、信息、资源的流动性规模空前；另一方面，是走出去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的持续碰撞。在这样的超大规模的流动性面前，历史上旧有的政治形态、政治主体、政治行动者和政治原则需要重新定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人类社会过去积累的社会治理和政治协调经验正遭遇极大挑战，不仅原有的人群利益之争会被保留和放大，新的、多层次的复杂意义世界也正在被不断创造出来。支持全球化与反对全球化、拥护平等主义与拥护保守秩序、接纳穆斯林和反对穆斯林、拥护自由市场和 support 政府调控……这些对立冲突的观点，与纷繁复杂的利益取向纠结在一起，可以把处于不同实体空间的人们联合起来，也可以撕裂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个机构乃至一个国家。

思考世界，认识世界，最终是为了回归中国，回归行动。当下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而是“在世界中的中国”，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着世界，也受到世界的深刻影响。未来世界需要一种与更大空间尺度相匹配的人类交往模式。更大空间、更深层次、更多元化的人类交往在全球化资本和信息技术等物质条件的支撑下是可能的，但这种可能并不能保障一个良性的、和平的秩序，也有可能是全球性动荡，这也正是人类采取主动引导行动的必要性之所在。中国的人口规模和丰富历史，以及它在 20 世纪所经历的巨大变革、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使得中国有可能成为为未来世界探索一种良性秩序的主要实践主体。

与过去两个世纪相比，今天的实践也需要对基础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和回答。如果说 19 世纪剧烈的社会变革对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催生了新的学院体系与研究体系，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也催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思想家，那么，今天更大范围的社会变革，更加需要不同专业、不同领

域、不同职业的思考者和行动者共同参与、共同理解，分析变动中的世界格局。因而，这一项工作呼唤着知识层面的“社会化大生产”。怀着这样的认识和冲动，我们将发起和组织一系列关于“新周期”问题的研讨。我们也许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穿透目前各种喧嚣嘈杂的信息、扑朔迷离的预测、焦虑不安的心态，聚焦于复杂现象背后的历史动力，与大家共同思考 21 世纪的时代命题。

目 录

序言	新周期：逆全球化、智能浪潮与大流动时代	001
----	---------------------	-----

第一部分 逆全球化

探索中国发展的新周期	柯贵福 陶庆梅 / 003
21 世纪的大国协调	[美] 佩里·安德森 / 019
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	高柏 / 035
全球化的困顿与复兴	王湘穗 / 058
新型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柯贵福 陶庆梅 / 069

第二部分 智能浪潮

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哪里	路风 / 085
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路风 / 096
智能制造与产业升级	孙喜 / 117
“林张之争”背后的产业政策与经济治理	宋磊 / 129
大数据、机器智能和未来社会	吴军 / 140

第三部分 **大流动时代**

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	曹锦清 刘炳辉 / 161
流动社会下的基层治理	张静 / 194
市场经济与党群关系	刘磊 / 203
中国数据开放的政治语境与经济逻辑	李谦 / 215

代后记 两洋之间的文明	汪晖 / 231
--------------------	----------

第一部分 逆全球化

从今天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是具有象征性的历史事件，它的持续性和纵深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金融危机是早已出现的财富集中化和贫富分化趋势的戏剧性呈现，它宣告了八九十年代以来“历史终结论”式的全球化乐观情绪的终结。10年以来，世界并没有走出危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全球政经格局的不确定性也不断增长。在全球化前景复杂性日益凸显的当下，“逆全球化”这一概念也许未必能够准确描述当下的世界局势，但确实能反映时下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和忧虑情绪。而“逆全球化”的想象背后，指向何种现实趋势：是暂时性的调整，是持续的衰退和动荡，还是一个更好全球化形态的酝酿期？也是很多人的共同关切。

本部分的几篇文章，正是集中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探索中国发展的新周期》一文提出了新周期的概念，指出了中国与世界复杂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相互影响成为塑造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化的困顿与复兴》一文则从数千年世界历史的纵深来定义全球化浪潮，也由此指出，人类通过交流逐步交融的长期趋势并不会中断，人们由近及远、以达全球的历史进程将以新的方式复生。《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一文则以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出旧有全球化模式的内在困境，即开放型经济带来了全球化红利分配

的高度不平衡，但政府不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公众在危机中日益增加的恐慌，反而要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导致反全球化诉求暴涨。《21 世纪的大国协调》《新型全球化时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文则试图指出，我们无法沿用旧的经济改革和政治认知框架，来形成有效的动员和平衡机制，应对当下的全球问题。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以“一带一路”等战略为基础的实践探索，不能简单重复传统资本和产业输出的旧逻辑，而是需要找到一条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发展道路。

探索中国发展的新周期

——关于“新周期”的探索与展望

柯贵福 陶庆梅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动的政治、经济改革战略，开启了中国特有的政经周期，伴随反腐整风、吏治刷新、经济结构调整、军队改革等一系列大手笔举措，意识形态领域及社会舆论呈现出剧烈分化的态势。人们对未来充满期待，但对新的政经周期背后的历史逻辑却聚讼纷纭。有人怀疑这是否还是“一百年不动摇”思想路线的继续？继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之后应有普世主义的政治改革的历史逻辑能否得到遵循？有人则由于30年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化、伦理失序、环境恶化，而干脆主张重返共和国第一个30年。

实际上，上述种种争论可能都已经脱离了当下的实际：一方面，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30年改革开放所依循的搭欧美世界经济便车的模式已经难以延续，作为后发国家效仿对象的代议制民主及其政党宪政制度也大面积失灵，曾经的“政经改革模板”都已经失效；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剧烈变动，以农民工、城市白领、企业家为主体的新阶层正不断生成，传统的工农社会正不断重组，政府治理的对象已从农耕时代的静态社会，加速转变为高度流动的动态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已从传统的集体主义转向权利意识突出的个人主义，因此，重返前30年的老路也已经不具可能性。

以上种种明显的经济、政治、社会变动趋势，均提示人们，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前方，隐约呈现出一些新的基础性的规律，仿佛出现了新的周期——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共和国的第一个周期，邓小平时代是共和国的第二个周期，那么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是否正在步向一个新的周期？

我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期待和想象，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础性条件之上，必须建立在对可能存在的新周期的深刻理解之上。否则，一切的呼吁都只是政治幻想。

本书的目的，即在于讨论自十八大以来新的政经周期背后的历史逻辑，揭示内在于当下中国种种争议不断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层规律，从而使人们的认识和行动更加自觉，更加能动地导向未来。

一、新的内外关系格局

（一）全球化变局与中国发展路线的调整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开始遭遇较大困难，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结构性矛盾凸显，中国开始告别已经延续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期，步入“新常态”。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常态”、理解当下的困境，我们有必要追溯过去一轮经济增长的历史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迁的原因。

中国过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长，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也将西方带出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滞胀危机，带动了全球经济走向新一轮的繁荣。

从表面上看，滞胀问题源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在已有的空间格局之下，资本的流动性已经到达顶点，没有了价值洼地，生产链条中不同区域内生产资料价格趋于一致，持续盈利不再可能。为了走出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西方各国也进行了一些主动调整，通过市场化改革、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如里根和撒切尔改革）重新理顺了资源配置体系，再度激发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改革只是存量的调整，真正的增量来源于资本活动空间的升级与扩大——在物理空间的广度和虚拟空间的深度上都能得到扩张。正像马克思为我们揭示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农业文明时代的核心特征，是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要求资源和市场可以不断开拓，由此资本才能无限增值。开拓资源和市场，就是开拓新空间，地理大发现、技术革命，都是在不同层面开辟新空间。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新的空间和价值洼地，融入全球市场体系之中，而接下来的八九十年代，苏东社会主义体系瓦解并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变迁，带来了对原有空间的深化利用，开辟了虚拟领域扩充资本的活动空间。这也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到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资本主义的追踪者与研究者向我们揭示的：随着资本量的增大，资本所需的空间也需不断扩大，需要从一个竞争加剧的旧空间，跳跃至一个可以进行新一轮物质扩张的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新空间。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加入，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推进了生产环节的全球分布，意味着全球生产体系的“升级扩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利用其最具竞争力的优势——劳动力的高素质与低成本，降低了全球生产链条的生产成本，进而使自身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获得了巨额的贸易收益，而发达国家也享受了中国低成本商品的红利，中国与西方相互需要，各取所需。

然而，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结束了。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的持续性不利影响，已经超出多数人的预期，经济复苏面临重重困难，全球性的贸易与生产规模处于持续性的下降轨道。例如，衡量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之一——劳动生产率持续性下降：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从 1999 年到 2006 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速为 2.6%，2014 年这一数值下降至 2.1%。美国作为发达经济体的代表，其劳动生产率也持续下降：2008 年至 2015 年，美国年度劳动生产率平均增幅约为 1.5%，不到上一次经济繁荣期（1995—2003）年均增幅（3.5%）的一半。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幅，也从 2010 年前后 10% 左右的年均增幅持续下降至 2015 年的 7% 左右。

除了这些具体经济数据的下滑，金融危机的持续性影响，还进一步表现为世界经济与政治治理体系出现严重困难。全球化秩序的三个支点——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秩序、以美元信用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以 WTO 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都受到冲击和挑战。

对于美国、欧洲而言，一方面，因自由贸易对其不再有利，它们不断推出贸易保护政策；另一方面，它们也逐渐以 TTP、TTIP 等区域性经济政治设置，从全球化逐渐退后到区域整合，以此隔绝风险、整合区域市场，为将来更严酷的竞争积蓄力量。WTO 体系因此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动荡使得国际政治经济的薄弱环节更易发生混乱。中东、非洲、拉美这些地区当前出现的社会危机和区域战争导致的难民等问题，又会向欧美地区扩散。联合国等传统国际政治协调机制，在这样的场景面前显然已无力应付。而为了应对危机，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及其退出，导致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不断孕育新的金融风险，暴露了国际金融秩序的失序危机。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在更深层次上，意味着过去 30 余年全球经济持续高歌猛进式的增长已经走到尽头；持续 30 余年的狂飙突进的资本全球化历程，也已进